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缝纫机与近代  
上海社会变迁  
(1858—1949)

袁蓉著



FENGENJI  
YUJINDAI  
SHANGHAISHEHUIBIANQ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

# 缝纫机与近代 上海社会变迁

(1858—1949)



---

FENGRENGJI  
YUJINDAI  
SHANGHAISHEHUIBIANQIAN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袁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8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ISBN 978-7-5326-4982-2

I. ①缝… II. ①袁… III. ①缝纫机-工业史-上海-  
1858—1949 IV. ①F426.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8128 号

---

---

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 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 (1858—1949)

袁 蓉 著

---

责任编辑 王圣良

助理编辑 李婉青

装帧设计 明 婕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0 000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4982-2/F·250

定 价 68.00 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512-66700301

# 总 序

熊月之

上海近代历史,有一个特点,我们对其拥有的资料越是繁富,思考得越是深沉与持久,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惊奇和兴味就越是历久而弥新,这就是笔墨难摹的复杂性。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sup>[1]</sup>

这里人口多元。国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安排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犹太等。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包括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美国总会、法国总会、德国总会。日本人则自成社区,讲日本话,住日式房屋,吃日本料理,建日本神社,办日本学校,出日文报纸,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外国银行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获得在中国发行货币的权利。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在上海设有银行,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其中英国 4 家,美国 3 家,日本 2 家,法、德、荷、比各 1 家,还有 5 家是合资银行。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和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宗教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都相当繁盛。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

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些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外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国、法国、中国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国、法国、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

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为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藪,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以色列、印度……全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她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

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她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她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近代上海之所以会出现一市三治，出现如上所述的那么多的多元，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领土的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20 世纪 30 年代，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曾觉之，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对上海现象进行分析，认



为上海将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sup>[2]</sup>

所谓的“四不像”，所谓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就是异质文化和谐相处。

研究如此复杂的城市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丛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丛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则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花这么大精力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

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也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丛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丛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也有复旦大学等其他单位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先后承担过“上海通史”“上海大辞典”“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外国文化地图”与“外语文献中的上海”等多项国家与上海市课题,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丛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此前,

我们已经出版了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凡 25 种，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这套《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风格、体例一如前书，唯涵盖范围更广，社会期待更高，出版要求更高，我们也只有更加尽心，以为回报。

2013 年 6 月 12 日

### 注 释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0 页。

[2] 新中华杂志社：《上海的将来》，第六六条，中华书局 1934 年出版。

# 目 录

总序 .....	1
导言 .....	1
第一章 “人类发明物品中的女王” .....	16
一、缝纫机的问世 .....	17
二、缝纫机对西方妇女生活的改变 .....	24
第二章 申城舶来品 .....	37
一、缝纫机进入上海的时间 .....	37
二、缝纫机在近代上海的销售过程 .....	46
三、缝纫机译名、价格考 .....	65
第三章 早期缝纫机购用群体的反应 .....	81
一、红帮裁缝的“拿来主义” .....	81
二、苏广成衣铺的“半推半就” .....	91
三、大帮裁缝的“吃饭家什” .....	99
四、从“趋时显摆”到“摩登女红” .....	109

第四章 洋商、华商与上海缝纫机产业 .....	130
一、“不知疲倦”的美国胜家 .....	130
二、“天下无敌”的“铁蝴蝶” .....	142
三、“巧夺天工”的“飞人” .....	149
第五章 缝纫机与服饰产业 .....	161
一、“只重衣衫不重人”——西装业 .....	163
二、“西服的陪衬”——衬衫业 .....	169
三、“噱头与蹩脚”——鞋帽业 .....	178
四、“拎包裹时代的终结”——时装业 .....	182
结语 .....	189
一、从“奇技淫巧”到“有裨工业”——一种观念的转变 .....	189
二、机器使用与性别的关系——一件器物的衍生 .....	199
三、革新的力度与时尚的速度——一个社会的变迁 .....	203
附录 .....	210
一、1891—1893 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0
二、1894 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0
三、1895—1900 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1
四、1901—1910 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2
五、1911—1918 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3
六、1919 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	214
七、1920 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	214
八、1921—1934 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	214
九、1934—1935 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	216

十、1936—1942 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	216
十一、1940—1942 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	218
十二、1946 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	220
十三、1946—1947 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	220
十四、1948 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	222
十五、1891—1933 年缝纫机进口 .....	223
十六、1952 年 7 月 4 日上海市缝纫机器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会员的产品目录 .....	224
十七、胜家缝纫机公司 1851—1949 年历届董事长 .....	229
十八、缝纫机发展大事记 .....	229
十九、调查问卷 .....	237
二十、部分与近代上海相关的缝纫机广告摘录 .....	238
参考文献 .....	249
后记 .....	262

## 导 言

缝纫机,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件人们十分熟悉的家具。作为当时中国人结婚向往必备的“四大件”,<sup>[1]</sup>尤其当提及上海产“蝴蝶牌”“飞人牌”缝纫机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家具中的“上海货”。“家具是人类住宅居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它和居室中其他必要设备一起,同样是居住者生活习性的主要表现物”,<sup>[2]</sup>这是毫无疑问的。在那样的年代里,缝纫机正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家具中的精品,同时也是体现主人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人们或许并不了解缝纫机原来也是一件“舶来品”,它进入上海以后经过若干年的传播发展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接受、使用、销售、维修乃至制造生产,然后逐步进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最终受到青睐。根据可查资料,可以断定缝纫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的时间是在 1872 年 12 月 14 日之前,由晋隆洋行从国外运进数架缝衣机器,每架“记洋五十两”,<sup>[3]</sup>可见当时进口的缝纫机数量有限,可想而知也是价格不菲的,但毕竟开始了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机缘。

每种新机器的问世,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曲折的历程,而缝纫机的诞生,可谓是波折最多的一种。因为,它是服装业由手工走向机械化的开路先锋。作为一种新生物品,缝纫机是由英国人最早发明

的,时间是在18世纪末。但其后却经过法国人再到美国人的“前赴后继”,才成为商品而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真可谓“一波三折”。与缝纫机的诞生相比,缝纫机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尽管是缓慢的,并且有起有伏,发展亦极不均衡,但毕竟是“有惊无险”。当然,缝纫机早期在上海的推广,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使黄皮肤的中国娇娘和白皮肤的爱尔兰淑女踩上一样的踏板”,<sup>[4]</sup>与中国人的缝纫习惯、服装的改制,乃至政局的动荡、社会的变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和民国政府的建立,各业制服的兴起、西服的引进、中山装的推广、时尚女装的流行、旗袍的普及等,这一切的变化、变革和革命,又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最早接触这一“西方器物”的上海人得以广泛使用缝纫机的催化剂。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同时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般而言,机器的出现与发展往往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反过来又大大地推动了机器的发展与推广。缝纫机登陆上海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鸦片战争后,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古老帝国风气日开,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人们的穿衣观念慢慢开始发生变化,日益趋向观赏性和实用性。“易服”之舆论首先从思想界发出。1892年,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提出“易西服”的主张。他说:“变法之说,更仆难终,请为相公先陈三始:盖欲化满汉文武之城,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sup>[5]</sup>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也曾说:变法之先,服饰先变,社会变革,举凡四变:一变风气、二变教育、三变实业、四变制度。变风气者,亦有四变:变服饰、变礼仪、变婚姻、变语言。西洋服饰,简洁明快、干净利索,可仿效之。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更是上书《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指出“当新朝必改正朔、易服色、殊



徽号、异器械”“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褰衣博带，长裾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亦尤佩玉鸣琚，以走趋救火也，诚非所宜矣”。<sup>[6]</sup>这些言论将服饰变迁的重要性与政治变革的成败相提并论，无疑是大大促进了社会服饰的变革及社会风俗的改良。上海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缝纫机作为西方服饰的主要生产工具，在上海的推广不仅使部分缝纫工人从繁重的劳动中得以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衣服的产量大大地提高，款式更加多样美观、别出心裁，使得人们可以穿上同样款式的衣服，时装业也由此兴起，时尚也得以风靡上海滩。

当然，缝纫机在上海推广的速度相对西方国家而言尽管是缓慢的，但我们仍能在半个多世纪的上海历史中找寻到缝纫机传播发展的基本轮廓和规律。从 1872 年到 1949 年，上海缝纫机产业从全部由外商垄断生产销售到华商代销维修，到零件生产，再到整机生产，缝纫机的受众从红帮裁缝到传统成衣师傅再到家庭非盈利使用，以及由缝纫机所带动的新兴的机制缝纫业的蓬勃发展，这一切的变迁都使近代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巴黎”，“穿在上海”也绝对不只是一句随口说说的戏言。

缝纫机在近代上海的历史命运，它的嬗变和发展与上海开埠，特别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到 20 世纪初中叶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所以密切，是因为这一代表西方工业革命产物之一的生产工具与近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等息息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缝纫机在上海的推广是一种理念的转变乃至社会变革的一大成果。一方面，政治变迁、经济转型、文化碰撞、时潮冲击等都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西器”的